

【出版史论】

观风俗:19世纪欧洲中国小说 阅读史的一个视角

宋莉华

【摘要】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自17世纪传入欧洲后却登堂入室,入藏各类图书馆,由私人藏书变为公共藏书,使中国小说文本得到妥善保存,传播范围不断扩大。19世纪随着东方学的兴起,中国小说以风俗志形式进入欧洲阅读史,东方学家认为小说比其他著作更具有观风俗的优势。中国小说以译本和中文刻本形式流通欧洲,看似其读者各有所属,实则他们之间相互交叉、影响,都以观风俗为阅读旨趣,并指向中国形象的建构。中国小说也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一部分。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史,体现了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和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包容力,以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

【关键词】中国小说;阅读;观风俗;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宋莉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27~3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65)。

中国古典小说以多种途径流传到欧洲。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以观风俗为旨趣,这俨然成为阅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阅读史带有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双重视角,它重点探讨书籍抵达读者手中的途径和方式、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以及阅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社会和历史。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西传研究中引入阅读史视角,有助于考察中国小说阅读如何影响西方社会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方式及路径,并将研究推进到发生学、形象学、阐释学的多个领域。

一、中国小说在欧洲的度藏与流通

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研究19世纪欧洲读者的中国小说阅读史,首先需要厘清中国小说以何种途径抵达欧洲、被何人收藏在何处,又在哪里可以读到这些小说。

欧洲最早的中国小说藏本出现于17世纪初。据

荷兰学者邵博(Bert van Selm)研究,1603年荷兰探险家兼海军上将韩斯璩(Jacob de Heemskersk, 1567-1607)带领舰队,在亚洲海上劫夺了从澳门出发的两条葡萄牙大型商船,并将船和货物运回荷兰。第二艘船中的货物于1605年3月运抵阿姆斯特丹,9月21日拍卖。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批货物中包括了为数不少的中文书籍,据艾俊川先生考订,牛津大学所藏增插本《水浒传》正是这批汉籍中的一部,这也是最早流传到欧洲的中国古典小说。对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残叶,馆方有明确记录,是由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墨路腊(Paullus Merula, 1558-1607)送给英国人某氏的,后转赠牛津大学。^①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a)也佐证了上述推断。高第在该书“目录文献”(“Bibliographie”)部分提到的第一个目录就是1605年由欧洲负有盛名的大书商黎高来(Cornelius Nicolai)

编纂的汉籍目录。当时,他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了一批中文书籍,并印制了相应的目录。高第引用1683年法国学者阿德里安·巴耶(Adrien Baillet)在《学人的判断》(Jugemensdes sçavans)一书中对这一目录的介绍:“这是书商印制的关于一些特定图书的目录,是160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目录书。上面的书首次从中国或中国人领域运来,墨水和纸张都十分珍稀。”^②

随着欧洲的“中国风”(Chinoiserie)在18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各国王家图书馆开始有意识地在中国及其周边汉文化圈国家收购汉籍,运回欧洲。法国王家图书馆是首倡者,其最早的汉籍来自路易十四时期的主教马扎然(Jules Mazarin)收藏的16册中文书,1668年入藏王家图书馆。1697年,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又从中国带回康熙皇帝赠给路易十四的22种、312册中文书籍。1719年比尼昂(Jean-Paul Bignon)担任馆长后,开始大量采购汉籍,特别是在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等人的帮助下,从中国购置了大批图书,其中包括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拍案惊奇》等。柏林王家图书馆的第一批汉籍则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购买并入藏的。1683年,柏林的选帝侯宫共收藏了约300册汉籍。^③1822年,德国东方学家柯恒儒(Heinrich Julius Klaproth)编纂《柏林王家图书馆藏汉满书籍和写本目录》(Verzeichnis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hu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Bibliothek zu Berlin),著录的57种汉籍中包括小说《水浒传》《列国志》《三国志演义》等,多为17世纪木刻插图本。1831年该馆图书管理员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④从中国为图书馆购买了236种、共计2410册中文图书。1840年,威廉·肖特(Wilhelm Schott)在柯恒儒目录的基础上进行增补,编订《御书房满汉书广录》(Verzeichnifs der Chinesischen und Mandschu-Tungusischen Bücher und Handschriften der Königlichen der Bibliothek zu Berlin)。肖特在前目的基础上补充了10种小说,包括《开辟传》《隋唐演义》《反唐演义传》《唐五代传》《飞龙全书》《西洋记》《花笺记》《岭南逸史》《二度梅全传》《鬼

神之德》。而《三国志演义》一书,除柯恒儒著录的版本外,又增加了该馆之后入藏的两种版本:一为亚历山大·冯·洪堡爵士(Freiherr Alexander von Humboldt)从中俄边境考察时带回并捐赠的版本,一函4册精装本,1644年刊行;一为嘉庆十九年(1814)刊本,也是一函4册。1843年5月27日法国《图书业杂志》(Journal de la librairie)有一篇题为《论中国的图书贸易以及它们在欧洲的成本价》的文章,介绍了从中国订购图书的方式、环节及费用,并列举了1837-1839年间汉籍贸易的几个实例,反映出当时欧洲与中国的书籍贸易已成规模,^⑤这也是欧洲各国获取中国小说的重要途径。

欧洲的一些贵族和学者个人也开始收藏汉籍包括小说。如英国藏书家、天文学家、第25世克劳福德伯爵亚历山大·威廉(Alexander William)从阿尔斯坦(Pierre Léopold van Alstein)手中购得其所藏汉籍,之后又进一步通过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书商,以及中国的代理商为其私人图书馆收购汉籍。其中部分图书来自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卜铁(Guillaume Pauthier)和柯恒儒的私人藏书。^⑥克劳福德伯爵还邀请皇家天文协会秘书长约翰·威廉(John William)为它们编纂目录。1881年,这批藏书由第26世克劳福德伯爵林赛(James Ludovic Lindsay)继承,1895年爱德蒙(John Philip Edmond)重新修订了目录,收录汉籍达445种。1901年,这批藏书出售给曼彻斯特大学约翰·瑞兰德图书馆(John Rylands Library),其中含有多部小说,如清乾隆六十年刻本《新刻异说反唐演传》、清道光九年勒瓦瑟刻石堂石印本《新镌批评绣像玉娇梨小传》、清道光十年储英堂重刊道光二年东观阁本《红楼梦》、清道光二十一年玉山楼藏版本《四大奇书第一种》等,多为嘉庆、道光年间的坊刻本小说。^⑦又如柯恒儒的父亲克拉普罗特(Martin Heinrich Klaproth),本身是一位化学家,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时,曾担任该校第一任化学教授,但他也收藏汉籍。1839年柯恒儒为父亲的私人藏书编纂了目录《已故克拉普罗特藏书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omposant la bibliothèque de feu M. Klaproth deuxième partie),其中包括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列国

志》《肉蒲团》。

欧洲私人所藏汉籍,往往以出售、拍卖或捐赠等方式,最终流向公共图书馆。第一个流向是大学图书馆。19世纪,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最集中的一次中国古代小说入藏来自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伟烈亚力在华收集汉籍约2万种,1868年他计划回国,亚洲文会理事会决定购买他的私人藏书,并筹备了一个委员会安排具体事宜。《北华捷报》报道称:“该会十分幸运(或至少即将如此)地获得伟烈亚力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多年收集的结果,所藏西人论中国的书籍以及中文图书的译本或许是最为完备的……不可能会有谁再去费力收集成这样一个有关中国和中国人著作的完备的图书馆,即使容易得到这些著作。而实际上许多珍本已不可再得,因此眼前这一收藏具有极高的价值。亚洲文会同意以伟烈亚力所提出的低价购买该图书馆,乃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⑧不过,实际上仅有一千余种书在1869年出售给亚洲文会,其余书籍则在1882年出售给牛津大学图书馆,成为“伟烈亚力特藏”,也使该馆汉籍数量翻了一番。法国汉学家高第认为,在华西方人中,只有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F. Wade)的藏书可与伟烈亚力匹敌。1886年10月,威妥玛也将他在中国四十余年搜集的满、汉文图书共计883种、4304部,悉数捐给剑桥大学图书馆。1898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为这批藏书编纂了目录,其中包括《三国志演义》《红楼梦》《云合奇踪》等9种中国小说的15种版本。

欧洲私人所藏汉籍的第二个流向是国家图书馆。如法国王家图书馆通过拍卖,于1840年购得柯恒儒藏书、1873年又购得法国汉学家卜铁藏书。1840年,该馆还向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购买了115种、共计3669册汉籍。^⑨这几位汉学家所藏中国小说甚富,使得19世纪该馆收藏中国小说数量持续增长。1902年古兰(Maurice Courant, 1865-1935)编订馆藏目录时,该馆所藏汉籍总量已达9080册,其中,古兰目录3940—4245条为长篇小说,4246—4291条为白话短篇小说,4292—4328条为文言小说。德国的情况也类似。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 1847-1901)的藏书、柏林大学满学家豪尔(Erich Hauer, 1878-1936)的私人藏书,最终都入藏德意志帝国图书馆。

第三个流向则是研究机构。如1823年成立的皇家亚洲学会,其汉籍藏书主要来自小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曼宁(Thomas Manning)、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郭实猎(Karl F. A. Gützlaff)、罗伯聃(Robert Thom)、弗里尔(Sir H. Bartle Frere)等人的私人捐赠。1838年基德(Samuel Kidd)编《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目录》,含小说35种。^⑩

小说在中国不登大雅之堂甚至遭到禁毁,但在欧洲登堂入室,入藏王家图书馆,由私人藏书变为公共藏书,这使得中国小说文本在欧洲较早得到妥善保存,传播范围不断扩大,被更多的西方读者所关注,开启了中国古典小说文本自东徂西的旅行。

二、以观风俗为旨趣的小说阅读

“书籍由历史创造,即它们是被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所塑造的。”^⑪19世纪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当时著名的法国学者如雷慕沙、萨西(Antoine-Isaac Silvestre de Sacy)、伯努夫(Eugène Burnouf)、奎阿特梅尔(Etienne Quatremère)、突尼烈(M. Jules Thonnellier)等,“所有充满好奇的灵魂都转向了东方这个领域”。^⑫欧洲读者对中国小说的阅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东方学家是最早的读者和译者。不过,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中国小说的文学艺术性,而是以观风俗作为阅读旨趣。

19世纪欧洲东方学家关于“风俗”的概念和理解沿袭自伏尔泰。他的《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一书,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风尚:“我的主要想法是尽可能地了解各民族的风俗和研究人类的精神。我把历代国王继承的顺序视为撰写历史的指导线索而不是目的。”^⑬伏尔泰的“风俗(mœurs)”概念,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法律、宗教、礼仪、风俗习惯、语言、饮食、衣着、房屋、园林等一切与历史文化习俗相关的内容,是民族精神、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他试图通过“风俗”透视其背后的民族精神。

这种对风俗的关注和研究,作为一种传统沿袭下来,影响深远。巴尔扎克甚至曾设想把《人间喜剧》的题目定为《19世纪风俗研究》和《社会研究》。当确定以《人间喜剧》为题后,他又把全书分为三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最为重要,包含《私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场景。他在该书前言中说:“读一读所谓历史,也就是读读那一堆枯燥讨厌的史实罗列,谁能不发现:古往今来(埃及、波斯、希腊、罗马,概莫能外)的作家,统统忘记了将风俗史传诸后世!”^⑩1885年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译《西学略述》,曾介绍西方的“风俗学”:

“风俗”一学,乃近泰西格致家所草创。原以备征诸荒岛穷边,其间土人,更无文字书契,莫识其始者,皆可即其风俗而较定其源流也。此学起于好游之人,或传教之士,深入荒岛,远至穷边。见有人民衣食皆异,兼之言语难通,无缘咨访。似此日记既富,要皆返国印售。格致家取而为之互参慎选,勒部成书,皆各即其婚、食、丧、祭、讳、算、起居,以测定其或为今盛于昔,或为昔盛于今。……近英人鲁伯格与戴乐耳,皆喜访查此学,大著声称。^⑪

艾约瑟这里所说的“风俗”,更偏重民俗,即“folklore”。

19世纪东方学兴起之初,东方学家希望通过获取具体的风俗知识和学问,展开对东方的探索,这是他们阅读中国小说和戏曲最重要的出发点。1826年雷慕沙在《玉娇梨》法译本序言中,提出要把中国小说作为对中国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的补充资料引入欧洲:“中国小说在这方面就填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白;这些小说仿佛是一种游记,在我们看来,它们要比旅行家的游记更加准确,更加有趣”,“中国小说是我们应该参阅的最好的回忆记录,即使是用来弥补地理著作的不足部分。”^⑫雷慕沙的法译本《玉娇梨》是欧洲最早的中国小说译作之一,它的读者包括德国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学者如苏格兰哲学家、评论家、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以及被称为“美国的孔子”和“美国文明之父”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等人。

为什么读小说而不是其他书籍呢?雷慕沙的法译本问世后,《亚洲学报》1827年第1辑第23卷曾发表对雷慕沙《玉娇梨》译本的书评文章:

中国文学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小说或罗曼司小说构成的,这类作品对那些想了解中国礼仪的外国人来说特别有价值。因为它所描绘的这些礼仪,除了戏剧外,没有其他任何媒介可以传达。在重视历史的风气下,展示家庭生活画面像是一种屈尊的行为,没有其他说教类著作会传达这样的内容。而在以私人生活为基础创作的小说或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这却能得到自然呈现。这些小说不仅使我们了解到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让我们知道由于作品的创作年代,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获得多样的色彩。^⑬

评论者在文中还谈到,他认为雷慕沙译本的优点在于其善于洞察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即其他国家的亚洲人都受浪漫主义影响而破坏了他们自身的文学传统,将浪漫引入历史著作。而中国人恰恰相反,即便在罗曼司小说中,他们也是历史学家,《玉娇梨》比一般小说更具有情节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即中国小说兼具史书的实录特性和作为文学作品的叙事生动有趣、充满细节描写的特点。1827年,俄罗斯也出现多篇介绍雷慕沙译本的文章,^⑭如1827年俄罗斯《莫斯科》(Москва)杂志第3期发表《文学史·中国与欧洲的长篇小说比较,选自雷慕沙译长篇小说〈玉娇梨〉法译本前言》。^⑮这些文章加速了雷慕沙译本的传播,在短时间内便出现多个转译本:1827年,英国伦敦亨特及克拉克(Hunt and Clarke)公司出版《玉娇梨》英语全译本,共2卷,每卷末均附有由巴黎亚洲学会会员皮克福德(J. H. Pickford)所做的注释,译序中明确提到:“读者应该知道,这个中国故事的英译本由雷慕沙的法译本转译而成,雷慕沙以他对这个特殊国家的文学的了解而闻名于世。”^⑯1827年德国斯图加特弗兰克兄弟(Gebrüder Franckh)公司出版《玉娇梨》(Ju-Kiao-Li. Oder, Die Beiden Basen: Ein Chinesischer Roman)德语全译本,也是从雷慕沙译本

转译的,1828年俄罗斯《雅典娜》(Аthenей)杂志第20期发表了从雷慕沙译本节选的俄文《中国小说〈玉娇梨〉节选》。^②

关于小说比其他著作更具有观风俗的优势这一点,《好逑传》的法文译者基亚尔·达西(Guillard D'Arcy)在1842年的译序中谈道:“传教士们的学术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法律、艺术和科学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但他们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关于中国人的个人生活细节……国家和个人有其截然不同的一面,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③达西认为中国人的“内在”主要通过家庭生活体现,只有在家庭中,中国人才会毫不掩饰地展露一切,而小说是了解中国人“内在”的最佳读物。“《玉娇梨》让我们更多地认识了中国上层阶级与文人的习惯……然而,现在这部小说(即《好逑传》)似乎在增加我们对这个鲜为人知的民族的了解。”^④法国学者古兰(Maurice Courant)在《朝鲜书志》(Bibliographie Coréenne)中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中国的严肃文学不能展现中国风俗,而俗文学可以向我们展现除贵族、官员之外的人,如闺中女子、驳船的船夫、工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画面。”^⑤

当然,“俗文学”范畴很广,并不只有小说,实际上戏曲也被视为反映风俗的重要体裁。法国自18世纪以来,常常把喜剧视为反映风俗民情的载体。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认为,“在众多可以为礼仪研究提供便利的著作中,我们大胆地将包括喜剧在内的戏剧作品列入其中”。戏剧的情节来源于一个国家独特的风俗,所有与该民族的风俗、习惯、仪式与惯例相关的内容,都必定天然地被纳入戏剧艺术之中。而巴赞之所以翻译《伶梅香》,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出中国喜剧以家庭生活为题材,可以将“中国人的风俗民情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⑥而陈季同也给他的法文著作《中国人的戏剧》(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étude de mœurs comparées)加了一个副标题“比较风俗研究”。不过,长年在华生活的德庇时,在比较了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后认为,小说在观风俗上更胜一筹:

要深入了解中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翻译通俗文学作品,主要包括戏剧和小说。关

于戏剧,笔者的观点与斯当东先生完全一致,即总体而言,中国戏剧不像小说那样能够回报译者的劳动,由于过于地方化和民族化而无法通过作品本身取悦读者。其细腻的风格和语言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会在翻译中消失,因此,余下的兴味也就寥寥无几了。一般来说,枯燥的戏剧对白,加上演员的表演所能表达的也就是生活和风俗画卷的不圆满的轮廓,而在中国小说中,这种生活和风俗则充满了生动的细节。”^⑦

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庇时在选择作品翻译时,很自然地偏重小说。尽管他也曾翻译过戏曲《老生儿》和《汉宫秋》,但数量与影响远远不及他翻译的《三与楼》《好逑传》《中国小说集》等小说。这里,德庇时考虑到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小说和戏曲接受度上的差异性。在他看来,戏曲的表演形式和对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风俗信息的完整表达。值得注意的是,雷慕沙一方面将中国小说等“俗文学”纳入学术研究范畴,提升了小说在东方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局限于自身的阅读习惯,难以接受中国小说的某些美学特征。他指出才子佳人小说通常花很多笔墨在环境描写和人物刻画上,这样的文字虽然优美,却只是堆砌华丽的辞藻。故事情节常因这类描写被打断,影响读者的阅读进程。^⑧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东方学家的阅读旨趣,正因为带着了解中国社会风俗的阅读期待,这些描写在他看来才会显得毫无必要,与其观风俗的阅读期待存在距离。

三、从风俗志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小说

19世纪中国小说以译本和中文刻本的形式在欧洲流通,看似译本和中文原本的读者各有所属,其实这两类读者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互交叉和影响,都以观风俗作为阅读旨趣。

那么,当时的欧洲读者通过读哪些中国小说观风俗呢?事实上,欧洲读者对中国小说的文本选择主要取决于译者。从现存译本看,《今古奇观》是译本数量最多的小说,其次是《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红楼梦》《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十二楼》《金瓶梅》《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搜神记》《搜神后记》《醒世恒言》,都有超过10种

以上的译本。此外,《警世通言》《花笺记》《白蛇精记》《二度梅》《画图缘》《白圭志》等小说的译本也较多。1930年陈受颐发表《〈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文中试图探究《好逑传》屡次在欧洲被翻译的原因:“《好逑传》篇幅虽短,而描写中国事物风俗人情之处颇多,而种类亦颇不少,不患单调,所以自十八世纪初年以至二十世纪初年,屡被翻译。”^②陈铨从1932年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揭示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后于1936年出版《中德文学研究》一书。他在书中提到《今古奇观》在欧洲也包括在德国都很受欢迎,不仅因小说内容丰富,而且“对于中国中等人家的思想行动生活风俗习惯,特别描写得尽情尽致”。^②

不过,对于欧洲读者而言,即使有多种译本,以小说观风俗仍存在巨大障碍,西方读者对小说中涉及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感到隔膜,以至于当雷慕沙翻译出版《玉娇梨》之后,有人疑心这部小说不是中国人所作,而是雷慕沙本人的作品,假托中国人的名字而已。在他们看来,只有雷慕沙才能创作出这样的杰作,一个中国人绝对做不到这样好,“一个像中国那样受人鄙弃的民族,不会产生这样的杰作”。^③对此,身在巴黎的陈季同深有感触:“一切愉快的、细腻的、快乐的东西,都被说成是高卢的;一切奇怪的、钻牛角尖的、扭曲的东西,就成了中国玩意儿。”^④1821年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出版《异域录》(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3, 14, 15),其中收录了英译本《玉娇梨》,不过仅概要性地译述了小说前四回。小斯当东解释个中原因:译者本计划翻译全本《玉娇梨》,但小说未能引起他足够的兴趣而使他完成全部翻译工作。第二个原因则是,这本小说不符合译者的目的,并且与欧洲人的观念和感情完全不符。故事的结局是作者不必要地求助于中国人所迷信的超自然力量,故事的主人公暗中与另一位同样可亲、但并不高贵的姑娘展开了一场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并不为这样的三角关系感到尴尬,而是与两位女士幸福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如果我们不仅仅将它视为对民族习俗的说明,或许反而能增加小说的趣味性。^⑤

如何帮助读者有效地获取小说中的中国风俗和文化信息?注释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途径。早在1761年帕西(Thomas Percy)翻译《好逑传》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原计划把注释减到最低程度,因为读小说的人很容易把注释略去,辜负编者的苦心。但是帕西很快就改变了策略,增加详明的注释,这是由于他认识到:

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思想的特殊路径和语言的特殊方式,和我们异趣特甚,非有细致的解释,不能明白……编者希望《好逑传》的译文和注解合拢起来,可以成为一部简明而不孤陋的中国纪闻的书。^⑥

帕西在注释中尤为关注中国的特殊风俗、书中的私名、中国的名物制度。他曾为“冗长”的注释向读者道歉,而他的注释有时也的确显得冗长,但同时又很有价值。当时欧洲重译《好逑传》的多位译者,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法、德、荷三种重译本中,帕西的英语注释都被全盘译出。其中论发誓、论瓷、论茶的注释,几乎称得上是严谨的论文。关于中国风俗偶有不懂的地方,又无从查询的,帕西则坦言相告。因而《好逑传》的注释,自有其独立价值。^⑦

1880年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该译本最大的特点或者说贡献在于书中提供了极为详尽的注释,“可以使我们了解译者所目睹的天朝大国的真实生活和习俗”。^⑧1867年英国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eyers)在《汉籍叙录》(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Chinese Books)中还感慨,西方读者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读者对《聊斋志异》这么痴迷:

欧洲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部小说为什么会风靡全国。以西方标准来看,它包含的故事、传说不仅毫无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而且大胆极端,叙述平淡无趣(尽管它体现了超自然的特性),不像同类型的阿拉伯故事那样展开宏伟、天才的想象。只有中国文学界才会注意到,作者的声誉与其说是取决于内容,倒不如说是建立在作者简洁的写作手法上,让人想起古代的史学家。他又加入了大量的知识和插图,这些插图取材于最经典的

书籍,可见他同时代的人有崇古之风。以“忧郁的解剖”风格讲述神奇故事在英国几乎不受欢迎;但在中国,无论是立在门口的看门人、午间休息的船夫、站立一旁的勤杂工,都和他书中的文士一样,会津津有味地玩味《聊斋志异》里的故事。^⑤

翟理斯的注释,成功引起了西方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兴趣。《聊斋志异选》共选译164则故事,注释多达759条,翟理斯甚至单独为注释编纂了一份目录。这些注释构成了一部中国风俗志,主要包括:对人物的注释,如关羽、嫦娥、张飞等;对器物的注释,如铜钱、漏刻、窗纸的材料、商贩用的锣等;对中国传统节气的注释,如清明节祭拜祖先,端午节赛龙舟和纪念屈原;对制度和典籍的注释,如官府机构、官员制度、刑罚制度、科考制度以及对四书五经、作诗的对仗要点等进行说明;描述中国人的观念,如男尊女卑、佛道等宗教信仰和鬼神迷信;对中国人风俗习惯的说明,如有关风水、婚丧、嫁娶和生子的描述,定亲、迎亲、婚礼仪式、回门、生儿生女的不同仪式、葬礼、祭祖仪式等;中国社会的法律法规,如中国的财产继承方式,商业经营方式中盐的经营许可;还有中国人的消遣活动,如游戏、杂耍、围棋等,设粥铺、建育婴堂等中国人的慈善活动,以及拐卖儿童、制假贩假等。翟理斯的注释本身就构成了一部杰出的中国风俗志,对西方人阅读《聊斋志异》不可或缺。美国汉学家罗弗(Berthold Laufer)认为,1925年美国出版《聊斋志异选》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将第一版中的注释和索引悉数略去,因为其中包含着有关中国风俗的极有价值的资料。^⑥

毫无疑问,阅读是一种个人性的实践活动,读者的阅读体验因人而异。但在东方学兴起的背景下,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形成了以观风俗为导向的主题,并俨然衍变为当时阅读行为中的一种类型学。谈到19世纪欧洲读者阅读中国小说,1827年1月31日歌德与助手爱克曼关于《好逑传》的谈话,总会被频频提及。歌德认为:“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以及英

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⑦1884年法国学者勒格朗(Emile Legrand)翻译出版《宋国寡妇、两姐妹:中国小说选》(La Matrone du Pays de Soung, Les Deux Jumelles, Contes Chinois)。他认为,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戏剧和小说作品丰富,而欧洲人对中国文学所知甚少,需要对中国文明进行长期研究。他之所以选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是因为故事既奇特又现实,最重要的是,对于欧洲读者而言,故事结局完全出乎意料。^⑧这些关于中国小说的看法,虽然包含着对他者的关注和对自我的反思,但实质上仍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在作祟。它暗含了两个前提:其一是自我中心主义;其二是以欧洲的需要为导向。德庇时在1822年《中国小说集》(Chinese Novels)译序中指出,对中国小说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如一夫多妻制,欧洲人肯定会感到奇怪,但我们翻译外国小说,寻求的是信息而非情感的一致。^⑨

观风俗作为主题贯穿在阅读的各个环节,对文本的选择、翻译和流通,都围绕这一主题来进行,并指向中国形象的建构。然而,当小说被视为风俗志时,读者将不可避免地以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支离的画面来拼凑中国形象,带来中国形象的扭曲和变形。对此,陈季同深有感触:“藉旅居欧洲十年之经验,本人可以断言,中国是世界上遭误解最深之国家。……还有人故意将我们放到幻灯片里,尽人皆知,我们会被吹嘘得如何天花乱坠!从像梅子一样在糖浆里扑腾的小人,到屏风上张口结舌的大汉,描绘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的是话题。这就是人们所知有关中国的一切!”^⑩

尽管中国小说是以风俗志的性质进入19世纪欧洲的阅读历史的,不过也切实推动了中国小说的传播,加速了中国小说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模式。”^⑪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从文学作品的跨文化流通、阅读角度重新界定了世界文学。它的突破性在于,摆脱了过去以地理或文学性为内核的单一坐标,无论是阅读、翻译,还是传播,文学的社会构造在其中得以凸显。当然,这里的社会,已经不再局限于作品的原语环境,而是充分注

意到了其潜在的跨文化特征。^③《今古奇观》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被翻译最多,从1735年法国传教士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将其译成法文、并收入杜赫德所编《中华帝国全志》后,不同语种的译本达25种之多。1873年,德国学者、外交官格锐塞巴黑(Eduard Griesebach)发表《不忠的寡妇——一部中国小说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演变》(“Die treulose Witwe: eine chinesische Novelle und ihre Wanderung durch die Weltliteratur”)一文,叙述了这篇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广泛传播。1897年,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 Hofmannsthal)根据《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改编了幕间小喜剧(Zwischenspiel)《白扇》(Der weiße Fächer),通过鰥夫福图尼奥(Fortunio)劝寡妇米兰达(Miranda)忘记亡夫重新开始的故事,讨论了德语文学所关注的死亡、新生、爱情主题。德国学者齐默(Heinrich Zimmer)认为,《白扇》取材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收录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黑特(Ellen Ritter)认为《白扇》是参考了格锐塞巴黑的译文。^④舒斯特(Ingrid Schuster)在《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1925)一书中则提出,《白扇》的灵感得自法国作家法郎士(Antole France)的《文学生活》(La vie littéraire, 1891)。书中曾评论陈季同编译的《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其中包括《白扇夫人的故事》(Histoire de la dame à L'éventail blanc),成为霍夫曼斯塔尔《白扇》的题材来源。^⑤1875年柏林东方语言研究院汉学教授阿伦特(C. Arendt)把《东周列国志》的前两回译成德文《褒国的美女》。德国译者库恩(Fraz Kuhn)参考阿伦特的译文后进行了重译,其中改动、删节之处颇多,因为他并不是为了那些同行专家,而是为了众多受过教育的读者翻译的。德国作家皮尔包(Otto Julius Bierbaum)则把阿伦特不长的译文演绎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作者老实地承认,他并不了解中国,也不想费力去写一部真正代表中国文化的小说,只不过是写一本有趣的书。^⑥无论如何,上述中国小说以翻译、改编、戏仿等多种形式已经融入欧洲文学,具有了世界文学的特性,尽管其中不乏西方主义的视角。

书籍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书籍的阅读和流通是人类传播知识、交流文明的过程。19世纪欧洲的中国小说阅读史,体现了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的新定义,形塑了一套“关系”谱系来界定世界文学,这个谱系不仅勾勒过去,同时更倾向于连接未来,^⑦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包容力,以更好地推动文明互鉴。

注释:

①艾俊川:《从欧洲回流的插增本〈水浒传〉残叶》,《华西语文学刊》第11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

②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Ernest Leroux, 1878, p. 835.

③钱军玲:《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 https://www.sohu.com/a/378368209_562249。

④1833-1852年期间,诺伊曼曾担任慕尼黑大学的汉语教授。

⑤李声凤:《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2—213页。

⑥ <https://www.library.manchester.ac.uk/rylands/special-collections/exploring/a-to-z/collection/?match=Chinesecollection>。

⑦张宪荣:《曼彻斯特大学the John Rylands Library所藏明清珍稀小说知见录》,《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4期。

⑧North China Herald, Nov. 28. 1868. 译文参见汪晓勤:《伟烈亚力的学术生涯》,《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1期,第23—24页。译文据《北华捷报》原文有改动

⑨<http://archivesetmanuscripts.bnf.fr/ark:/12148/cc3883j>。

⑩1963年皇家亚洲学会700余种.5500册汉籍,最终被移交英国利兹大学图书馆。

⑪Simon Fliot & Jonathan Rose, "Introduction",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Pub., 2007, p. 1.

⑫M. Jules Thonnellier, "Préambule", 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Orientale, Paris: Ernest Leroux, 1880, p. VII.

⑬伏尔泰:《科尔玛公证文书》,见伏尔泰:《风俗论》,上册,“译者前言”,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页。

⑭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第一卷,“前言”,傅雷、何友齐、

袁树仁、王文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页。

⑮艾约瑟:《西学略述》,卷七,“格致·风俗学”,光绪岁次丙申(1896)镌,上海著易堂书局发兑。

⑯钱林森:《法国汉学家论中国文学:古典戏剧和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67—68页。

⑰The Asiatic Journal and Monthly Register for British India and Its Dependencies, 1827, Vol. X XIII, June, p. 789.

⑱柳若梅:《中国文学在俄罗斯:20世纪以前的早期积累》,《汉风》2017年第2辑。

⑲Р. Рожалин, История словесности, "Сравнение романов китайских с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из предисловия г. Абель Ремюза к роману Ю-Киао-ли или двоюродные сестры", Москва, 1827, 3, стр. 22-50; отрывок романа, 10, стр. 121-148.

⑳"Advertisement", Iu-Kiao-Li; or, the Two Fair Cousins, London: Hunt and Clarke, 1827, p. VIII.

㉑И. КР.(пер.), Ю-Киоа-Ли,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Атений, 1828, 20, стр. 323-344.

㉒Guillard D' Arey, Hao-Khieon-Tchouan, ou la femme ac-complie, Paris: Benjamin Duprat, 1842, p. I.

㉓Guillard D' Arey, Hao-Khieou-Tchouan, ou la femme ac-complice, pp. VII-IX.

㉔Maurice Courant, "Préface", Bibliographie Coréenne, Tome I, Paris: E. Leroux, 1894, p. XVI.

㉕Bazin aîné, Théâtre chinois: ou, Choix de pièces de théâtre, composées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 Paris: imprimé par autorisation du roi à l'Imprimerie Royale. 1838. p. XXIII.

㉖J. F. Davis, Chinese Novels, London: John Mumay, 1822, pp. 9-10.

㉗Abel Rémusat, "Préface",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s, Paris: Moutardier, 1826, p. 67.

㉘陈受颐:《〈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岭南学报》第一卷第四期,第129页。

㉙陈铨:《中德文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㉚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19页。

㉛陈季同:《巴黎印象记》,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6年,第55页。

㉜George Thomas Staunton, Narr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3, 14, 15, London: John Murray, p. 241.

㉝Thomas Perey, Hao Kiou Choo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Vol. I, Lndon: R. and J. Dodsley, 1761, p. XXV. 译文参考陈受颐:《〈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

㉞陈受颐:《〈好逑传〉之最早的欧译》,第142页。

㉟"Books on Folk-Lore Lately Publishe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Folk-Lore Record, Vol. 4, 1881, p. 192.

㊱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Bibliographical Notes on Chinese Books", Notes and Querries on China and Japan, 1867, Vol. 1, No. 3, p. 25.

㊲B. Laufer, "Book Review: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39, No. 151, 1926, p. 86.

㊳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㊴Emile Legrand, "Préface", La Matrone du Pays de Soung, Les Deux Jumelles, Contes Chinois, Paris: A. Lahure, 1884, p. XXVIII.

㊵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pp. 9-10.

㊶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弁言”,段映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㊷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

㊸季进:《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㊹Ingrid Schuster, 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1925, Bern: A. Francke AG Verlag, 1977, S. 131.

㊺Ingrid Schuster, 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90-1925, S. 132.

㊻陈铨:《中德文学研究》,第28—29页。

㊼季进:《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